

淺析《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的學術價值與使用方法

• 王靖雨

摘要：目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多關注《蔣介石日記》原文內容，對這部日記自身的學術價值(信度和效度)和使用方法相對缺乏討論。本文通過對1949年前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進行話語和情感分析，並將其與其他抄本進行比較，從縱、橫雙向對手稿本的真實度(authenticity)、信度(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和使用方法進行討論。就《蔣介石日記》這一個案來說，本文強調手稿本具有無可比擬的真實性和重要性，不能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以及任何抄本代替。日記中夾雜明顯的情感色彩，對於蔣介石的家庭、人際關係等的記錄，基本可以認為是真實的；對於蔣介石沒有記錄的重大政治事件，基本可認為事實真相或許不利於其歷史評價；其大篇記載的，則可以從中推測其記錄目的。

關鍵詞：《蔣介石日記》 信度 效度 使用方法 話語分析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整理，並於2006年起分批對公眾開放，至今已經有十餘年的時間。這部日記收錄了自1915年至1972年7月的蔣介石手稿，幾乎是他每天工作、生活的記錄，每周、每月還有「反省錄」和「工作預定表」，整部日記多達七十六個檔案盒^①。其對中國近代黨政、外交、經濟、新聞史的研究深具意義，自開放以來，始終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蔣介石日記》研究的集大成者楊天石將該日記分為手稿本、仿抄本、類抄本、引錄本等數種版

*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蔣介石對新聞宣傳的建構與失控(1928-1949)——以《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為中心的考察〉歷時近三年，在廣泛收集、整理、比較美國與台灣地區民國史料的基礎上，完成寫作，其中摘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達六萬餘字，本文即在此基礎上寫成。

本。他認為斯坦福大學所藏的《蔣介石日記》應稱為「手稿本」；蔣介石秘書俞國華抄存的部分日記，由於從內容到格式與手稿本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稱為「仿抄本」；毛思誠對《蔣介石日記》的分類摘抄以及《蔣中正總統五記》，一般稱為「類抄本」；至於《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大事長編》）和《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應為「引錄本」②。

然而，目前近代史研究者多關注《蔣介石日記》原文內容，對這份材料的真實度 (authenticity)、信度 (reliability)、效度 (validity) 和使用方法缺少深入探討。本文根據筆者使用此份材料的實際經驗，從比較視野、話語分析及文本情感三個角度分析了《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在何種程度上為真實，以及怎樣鑒別日記中具體記載的真實度，並結合相關例子，解析其學術價值與使用方法。

一 問題的產生

(一) 漢語學界日記研究現狀

日記作為一種文獻研究材料，其本身也具有所有文獻研究材料的共性，即需要研究者首先考察文本本身的真實度、信度和效度。如徐雁平所言：「傳統的文史研究，基本上是以現存的文獻為基礎進行歷史還原與意義闡發；但作為研究基礎的文獻，其實並不十分可靠。文獻並不是歷史的全景式記錄，文獻的形成，在特定的時空下，有其表達意圖、選材策略、敘述偏向。」③因此，研究者需要具體分析日記在特定時空下的具體形成環境和表達意圖等問題。相較於回憶錄等，日記文本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因為少了忌諱，雖然有些隨意，且無論證，卻能夠一針見血」④。

日記研究包含兩層含義：一、對日記內容的研究；二、對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研究⑤。日記研究的限制，在於作者為記錄私生活而寫，研究者針對某一研究主題時需面對日記中大量的無效信息；即便是研究同一部日記，如果更換了研究主題，也需要再次大浪淘沙般重新尋找有用線索，極為耗費精力。近代重要政治、學術人物日記如《胡適日記》與《顏惠慶日記》多有語焉不詳之處⑥；《陳布雷日記》(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 日記字迹極為潦草，且大量重複記載個人生活瑣事；與《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一樣，還受到材料收藏地點限制，增加了研究者查閱和使用日記的難度。雖然日記研究存在各種困難，但本文認為，日記闡釋是日記研究中的一個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的重大問題，需要專門研究。

在漢語學界的日記研究中，對日記內容的研究是目前的主流。除上文提到的近代重要政治、學術人物日記外，地方士人日記如《黃金台日記》、《常惺惺齋日記》、《晚清使西日記》等均被學者引用，通過分析日記內容來總結當時的社會狀態或作者對各項事物的評價⑦。至於對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研究，更接近史料學探討，但目前成果有限。舒習龍雖是從史學理論出發，但止步於強調晚清民國日記對於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⑧；劉明月、范鐵權以《忘山廬

日記》研究為例，對日記的史料價值進行討論，主要集中在針對具體的某一學術問題，某人的日記中如何記載，以此來進行歷時、共時分析，歸根結底還是對日記內容的研究，未涉及日記作為材料的信度和效度^⑨。

關於日記的使用方法，除單純的文本使用外，還可以利用不同日記進行比較、互證。鄭會欣使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同時引用了《陳克文日記》與《王子壯日記》，探討抗戰時期後方高級公務員的生活狀況，認為「從幾位黨政軍服務的高級公務員日記中摘抄的部分內容，並不能反映全貌，儘管如此，亦可看出戰時公務員生活的貧困化所產生的影響」^⑩；徐雁平為探究文獻的相對價值，別出心裁地使用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在同一時期(1860-1862)的日記進行分析，可惜行文卻偏向於對日記文本中北京沙塵天氣的探討，對日記作為文獻材料的論述淺嘗輒止^⑪；劉增傑研究現代作家日記的文學史價值，也只是將楊沫、俞平伯等的日記進行簡單互證，但他提出「閱讀某些準備給別人看的日記文本，要保持相應的警覺」，這又引出一個日記使用中的常見問題：需要慎重區分日記文本形成過程中的「本人刻意」與「後編者刻意」^⑫。日記手稿本雖然有文字潦草以至於無法認清的情況，但它完全排除了「後編者刻意」，相對於類抄和彙編一般具有較高的真實度，手稿本中的語言習慣和情感對於研究者而言更是重要線索。

這一重大問題更可以細分為四個層面：其一，眾多版本的日記中，不同版本的比較價值與獲取難度；其二，不同原始材料互證，用以提高某一日記版本的有效性；其三，對不同日記的有效性進行大量個案分析，爭取得出普適性結論；其四，針對某一部日記的人物、用語、文本的具體分析，再將這份經過有效性評定的文本，用作歷史研究材料。本文即是針對1949年之前《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以下簡稱「手稿本」)的第一層面和第四層面，首先分析相對於各種抄本，手稿本具有非凡價值；其次具體剖析這部日記文本，說明其對了解蔣介石人物性格的價值和意義。

(二) 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通識性觀點

日記本身不是「信史」，而作為質性研究方法之一的日記研究，與所有質性研究方法的效度一樣，受到研究者素質的高度制約。日記某些內容在相關研究上的重要性，並不一定顯見於字裏行間，而這些信息恰恰是研究者需要解讀的。因此，日記研究是作者與研究者之間的對話。與日常對話相似，研究者需要綜合各種因素進行逐步甄別。任何日記文本的研究，均需要以作者為中心，放置於較大的歷史空間和文化脈絡中考察。

東西方學者對日記研究的這一通識性觀點都有不少論述。桑兵的《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一書雖然只是對日記文本的研究，但提出「不要以某一種日記為信史，應將各種相關日記相互參證，以求近真；不要簡單地以為日記即第一手資料，應將各種文獻比勘印證，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記所記即為全部事實，應掌握基本事實來看日記所記；不要僅僅從日記中各取所需地尋找自己要的材

料，而要了解記日記之人的為人行事及其記日記的習慣方式」^⑬。他在《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一書中更專門從史料學角度出發，指出日記使用應做到「知人曉事，而不僅做史料翻檢，各取所需」^⑭。

日本學者川島真在〈近代日本政治人物與日記——日本史學界對其史料價值與運用方法的討論〉一文中，特別提到丹羽邦男和佐佐木隆的觀點，前者從嚴格的史料學意義上將「公文書」和「私文書」進行區分，後者強調「不管怎樣的日記都是預想到『被閱讀』而寫的」以及「日記的記載是重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川島真以日本《昭和天皇談話錄》這一史料「從歷史研究者來看為二手史料」為例，進一步引入伊藤隆的觀點，即「天皇的第一手史料，是指天皇的日記」，可見日記即具有「私文書」的一手史料價值^⑮。

俄國史家巴愛琳 (Irina Paperno) 在《如何使用日記？》(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中提出，日記是一種融合「即時性」與「主觀性」、「私密性」與「公共性」的臨界作品，「日記寫作的過程，極大地受到寫作者個性和歷史語境的限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個人日記也是家族成員間的交流媒介、家族編年史，甚或是「特定社會語境的化石」。因此，任何日記都是個人與社會連接的節點，日記解讀是一種「過程解讀」，日記研究應置於更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注重社會發展的脈絡^⑯。

(三)《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已有討論

對於手稿本的真實性問題，大部分學者均認為其大體為真實的，而對於其信度和效度，部分學者則持保留態度。本文認為，手稿本大體是真實的，但其在何種程度上真實需要具體討論。至於對其作為史料的效度的評價，不應僅僅依據其面世是否推翻了某些學術定論；如能從手稿本中更深入地了解蔣介石的人格和他對某些人事的態度，也是一種學術效度的證明。

楊天石曾就手稿本的現狀和真實性的討論發表過數篇文章，認為日記寫作是蔣介石踐行儒家「立品修身」的重要工具，雖然隨着後來蔣介石權勢漸盛，日記中有諸多疑似「示人」之處，但從總體上仍不可否認日記的真實性和學術利用價值。他認為可以憑蔣介石生前未公布日記、在日記中罵人、在日記中記錄很多隱私這幾點推斷此日記文本大致是真實的^⑰。楊奎松比較了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國民黨當局四次暴力事件中手稿本的記述，通過比較研究來勘探蔣介石對同類事物的態度，從而判斷日記在何種程度上真實，以及蔣介石對某一事件是否真的知情，認為他在「一二一慘案」、「南京下關事件」及「李聞慘案」發生前並不知情，而「較場口事件」的發展走向則超出蔣介石的預想^⑱。

黃自進在〈蔣中正的訪日經驗(1906-1927)〉一文中雖未直接談及手稿本的使用方法，但多將蔣介石自述與其他檔案材料進行對比使用，例如在論及孫中山與蔣介石單獨見面的時間時，即對比了蔣介石自述和日本警視廳的檔案^⑲。家近亮子〈蔣介石1927年秋的訪日——《蔣介石日記》與日本新聞報導的比較分析〉一文的論述方法與黃自進文章類似，在使用日記的同時，利用其他史料

進行對比印證，同時提出「《〔蔣介石〕日記》的局限性在於最重要的事情，對自己不利的事情很多時候都不會記錄下來」^{②①}。王成勉在〈1947年魏德邁調查團的再評估——兼論蔣中正的應對〉中，則借助「魏德邁調查團」的相關史料以評估手稿本，通過文獻互證，認為蔣介石的日記「不可以從字面上來解釋」，「有時甚至需要反面的來解讀」^{②②}。

然而，史學界目前尚未有學術作品更加深入地討論手稿本的真實性、文獻價值和使用方法。因此，本文的討論不僅旨在填補相關學術空白，也通過反推日記材料本身的價值，為學界評價已有學術成果提供基礎。

二 手稿本與其他材料的比較價值

目前中國大陸的蔣介石研究，使用的檔案材料一般為《大事長編》和《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次之。如前所述，這幾份材料都對手稿本的內容進行了大量改編。段智峰指出了《事略稿本》的局限性，並列舉了其與手稿本之間諸多記錄的差異，例如《事略稿本》大量插入儒家經典論述，為蔣介石建構傳統道德典範形象^{②③}。目前中國很多名為依託《蔣介石日記》進行的研究，利用的「日記原文」全部引自《事略稿本》或者《大事長編》，在手稿本已經公開十多年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本身就缺乏學術嚴謹度。

《事略稿本》與《大事長編》注重的是將蔣介石的一切活動記錄在案，而蔣介石對這些事情的重視程度則無從考察。筆者在對照《事略稿本》與手稿本後發現，兩者的出入主要集中在前者對文字的潤色、對負面事件和語言的粉飾上，但仍有幾處涉及具體事實的改動。譬如，《事略稿本》在1932年7月29日記有「下午批閱電汪兆銘、羅文幹云：『頃閱勘日滬上各報載路透電消息，中俄復交內容完全披露。』」之說^{②④}，而手稿本中並無此記載，且全日沒有關於閱報的記錄，這就容易給新聞傳播研究者造成誤導。1938年6月28日，手稿本記有「預定四、別動隊人選之決定，五、政治部宣傳經費，六、見梁士純；注意一、倭寇求和甚急，此時應剛柔得宜，方不失機，言論應慎重，二、對英美俄法應積極運用，美國反倭之形勢日加矣，三、告倭民書」，《事略稿本》在此日僅摘錄手稿本中「注意二」的內容^{②⑤}。尤其對於手稿本中「見梁士純」一句，連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也覺驚訝：當時梁士純作為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著有《戰時的輿論及其統治》、《實用宣傳學》，他與蔣介石見面，想必涉及戰時宣傳的策略討論和部署^{②⑥}，由此可見手稿本的研究價值。

《大事長編》的一些記錄，本身就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手稿本原文的內容。如1932年3月4日，《大事長編》記載蔣介石對日本詐行以至民族存亡的憂慮：「一面宣傳停止戰爭，一面仍向我嘉定、太倉之線猛攻。公嘆曰：『昔者荀卿有言，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而亡。此荀子之論齊湣薛公也。今之倭國其詐行且過於齊湣薛公，而彼不知將因此危削而亡，思

之亦為東亞民族痛哭流涕不止長太息已也。』」²⁸實際上，手稿本當中並無記錄。《大事長編》常常使用的「公嘆曰」、「公自記曰」等語，極易讓研究者誤以為是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內容，而實際上這些內容並未出現在手稿本中，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他出處不可考的《蔣介石日記》版本，篡改更加嚴重，如網上流傳的一份《蔣介石日記》摘抄本，1926年6月23日有「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也！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的記錄²⁹，而實際上當日的手稿本內容為「上午靜坐，看俄國革命史，開宣傳委員會，下午往政治部訓話畢，往東校場參加沙基慘案紀念會演講，回寓會客辦事，往政治委員會開會」，可見蔣介石當天的情緒甚為平靜，與摘抄本所記大為不同。《大事長編》並無當日的記錄，僅在6月1日和29日有例行公務活動的記載³⁰。

此外，蔣介石與當時政治人物關係的密切程度，可以通過在日記中的稱呼窺見，如張學良在手稿本中多次出現。1930年11月19日之前，日記中全稱「張學良」，11月19日載：「會客分省各主席，各軍代表，中央委員，各公使，行政院各校講話，各顧問計劃，各處長，各部長會議，漢卿來談」，此處首次改稱張學良為「漢卿」，可見蔣張二人的關係發生了較大變化。同樣，張季鸞（本名熾章）在日記中從來都稱「季鸞」（季鸞是張的字），可以想像當時二人的密切關係和蔣對張的尊重。1931年「約法之爭」前後，日記始終以「胡」指代胡漢民，如2月25日寫道：「下午會客後，為胡事又發憤怒。」3月4日「晚宴立法委員說明胡案」後，在5日的日記中，蔣開始稱胡漢民為「展堂」，其中心理甚值得琢磨。《大事長編》的記錄則全程使用「胡漢民」，蔣介石的心理變化被隱去。

蔣介石是個容易情緒激動的人，他的情緒波動每每呈現在日記的遣詞用語當中。因此，手稿本的學術價值還包括用以全面分析蔣介石的用語習慣，從而推測他對一些人物、事件的真實看法。《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的文字經過修飾後，已經做不到這方面的研究。

綜上，手稿本的比較價值在於其更原始地保留了蔣介石的用語習慣和情感態度；相對來說，其他材料中所摘錄、類抄的《蔣介石日記》，在不同程度上隱藏了蔣介石的情感、用語甚至部分事實，因此，手稿本的學術價值更顯重要。

三 手稿本的形成與真實性

在《蔣介石日記》形成的早期，宋美齡曾專門就日記保存一事向蔣介石致信，此信夾存於手稿本的1928年日記檔案中，全文如下：

此日記本為兄帶往前方所用，當此軍事倥傯之際，最易失落，祈留心保守為荷，至每日一明證之言語，事實最為重要，因一言興邦，一言喪

邦，如一言一事記載其上者，一為他人所見，關係我兄前途非淺，千祈慎重為慮。美齡十七·三·卅。

此信提醒蔣介石應該妥善保管日記，如果被外人看到，影響必然非常大，認為日記所記載為「每日一明證之言語」，說明至少截至寫信當時，手稿本的內容大體是真實的。手稿本的真實性，與其形成過程中的「展示性」（預設後來讀者）、「自省性」（蔣介石所接受的儒家省身思想）、「有限性」（記錄的局限與對政治評價的顧慮）三點密切相關。

首先，人們在進行文字創作時，必然有一種向第三者展示的預設立場，「沒有不意識到他人視線的日記」，日記作者本身就是日記的第一讀者²⁹。正是因為日記的寫作過程處於一種嘗試從第三者角度作出的自我審視，才使得日記寫作成為一種自省的方式。然而，日記畢竟受制於作者的單一視角，只能呈現事實的一部分，楊奎松認為「有些人如胡適，每到關鍵時期，日記就避實就虛，語焉不詳」³⁰。就手稿本的個案來看，鑒於蔣介石作為重要政治人物，其日記不可避免地存在「展示性」的考慮。楊天石曾多次提及過它的真實性問題，認為「日記中記載有不能公開的事情……但日記內容又不能全信，有時候他也講一點假話，有的事情他還會完全不記」³¹。在1931年的「約法之爭」中，手稿本大量論述蔣介石的政治主張以及對孫中山意願的闡釋即是一例。

其次，日記與作者的個人性格和價值觀密切相關。黃仁宇認為，蔣介石深受儒家「省身」思想影響，寫日記是他反省自身言行、嚴格律己、提升「修養」的一種手段，他在日記中對自己行為的反省、規勸，對戰爭、國際形勢的積極推測，目的在於自我激勵、自我修養，不見得是為了留給後人一個好的印象³²。楊奎松也認為，「蔣畢竟不同於一般知識份子……蔣的日記，又並非如魯迅、胡適、閻錫山者，生怕被後人用來貶損自身形象……他必須用於正視自身問題，時常點醒敲打自己，以實現『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業」³³，在在說明了這部日記的「自省性」。

蔣介石深受陽明心學和宋明理學影響³⁴，寫日記時期講究修身手段，這種目的本身就保證了其日記的真實度。「律己」、「省身」等自我要求，在日記中俯拾皆是，如1925年12月9日記道：「一曰慎獨而心安，去人欲存天理。二曰主敬則身強，懍坎險，惕輕健。三曰求人則人悅，民胞物與，宏濟群倫。四曰習勤則神欽，敝精殫慮，困知勉行。」1927年4月7、8、9、22、23日，他均在日記結尾處寫下「立志養氣，求賢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欲，務實求真」。1937年5月12日，日記載「本日檢討去年日記及摘錄」，可見蔣介石有每隔一段時間回頭檢閱日記的自省習慣。

蔣介石從早年開始將很多資料交給身邊人員進行類抄：「20世紀20-30年代，蔣介石陸續將自己的日記、來往函電、文稿等許多資料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管。毛即利用這批資料編輯長篇性著作《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³⁵一方面，這是出於「省身」的目的——曾國藩著有《曾文正公日記類抄》，蔣介石的日記類抄應是有意以曾國藩為楷模，踐行修養工夫。另一

方面，蔣介石命令對其日記手稿進行類抄，這本身就暗示了類抄比手稿本更具「展示性」，對手稿本考察的必要性即基於此。

再者，日記的寫作還受到「自我審查」的限制。蔣介石將日記寫在預先印刷、有固定格式的紙張上，尺寸大約為今天一張橫放的A4紙。每頁有縱列十行左右，並印有「提要」、「天氣」等欄，載體本身對日記構成字數限制。大部分時間，日記並未超出一頁篇幅，可見蔣介石也許因應篇幅限制，對每日事項進行篩選，有記有不記。這種「寫」與「不寫」，本身就是經過其本人「自我把關」的過程。而蔣介石的身體狀況有時也影響日記的寫作，例如1928年8月16日至26日僅記「拔牙一枚出血不止在醫院調養」，8月29日至9月1日均無日記。這種長達半月未記實質內容的情況在手稿本中甚為罕見。

蔣介石在日記寫作的篩選還受到其對自身政治評價的估量所影響，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有限性」。他從未在日記中提及與宋美齡結合的政治動機，以及對其背後孔、宋家族財力的考慮。中國傳統「君子不黨」的價值觀，對蔣介石的日記寫作影響巨大。因此，考慮到身後的政治評價，蔣介石在具體的記事中常常採用「申辯」、「沉默」等手法（下詳），這是其日記的典型特徵，也可作為推斷研究和辯證考察「有限性」與「真實性」關係的重要立足點。

四 手稿本的話語分析與事實考察

日記作者的用語習慣是極其個人化的，研究者對作者及其寫作意圖的闡釋，對材料本身的史料價值影響巨大。受「省身」要求的影響，蔣介石並未在日記中故意「撒謊」，因此，首先要承認文本的真實性，其次是在「記」與「不記」、「怎樣記」之間進行話語分析，再者涉及具體的史實考證，需要其他材料的佐證；如將話語分析與具體史實進行相互驗證，則更能體現日記的價值。

如要掌握某一日記的精髓，必然要理解作者的用語習慣，從而對其隱含的真正情緒和事實進行推斷。據筆者觀察，手稿本絕大部分的記載僅為事實記述，但出於各種原因，蔣介石在記述過程中會流露出不易察覺的情緒，特意申明對某事「不在意」或「不知情」，或者對某一事件的記述特別冗長和詳細。對這些不易察覺之處進行話語分析，便可深入探究蔣介石在字面意義之外想要表達的真正內容為何。

（一）「不在意」：文本呈現與文本真實

1936年10月，是蔣介石五十大壽的慶祝月，社會各界的慶祝活動紛繁。10月29日，手稿本載：「雪恥，世界是一個有進步，有絕頂的階梯，今日為陰歷九月十五日，為余五十生辰，余並不在意也。」在全國祝壽之日，寫下「世界……是一個……有絕頂的階梯」，容易令讀者猜測此時蔣介石有「登臨絕頂」的心境；「余並不在意也」一句，在此十分突兀。隨後在31日的日記，記載「上午〔陶〕百川、漢卿、宜生〔傅作義〕等到洛祝壽，心實慚惶，九時到軍

民慶祝大會，全國民眾為此熱烈盛情，不知將何以圖報，惟期不負今日同胞之熱望而已」，可見此時蔣介石心中甚有起伏。考慮到他本人深具英雄主義的自負，如1944年8月11日日記中提到「如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不在意」有可能是一句反語。

手稿本中另一種「不在意」並沒有明確寫成文字，而隱藏在背後情節中，頗有意味。譬如，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後，日軍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經常對重慶進行地毯式轟炸，蔣介石多次置身於危險之中。1941年8月29日，蔣介石的貼身衛士被殺，幾乎危及蔣本人，但當日日記僅載：「內衛隊長唐偉舜，侍衛陳亦民皆受重傷，當時殞命；預定一，中俄協定內容之準備，二，研究倭美，如果戰後遠東將來之形勢與策略。」對於自己險些殞命一事，蔣介石為何絲毫沒有觸動？對比1929年8月24日至27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家中險些遇刺一事，蔣介石曾在日記中連續數天記載事件發展和偵破經過，並感慨「中正是誠有命矣」。可能因為1941年處於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美日兩國正在進行談判，一旦談判成功，日軍必然一舉吞併中國，這無論如何是蔣介石無法接受的。面對這種局勢，蔣介石並非不在意自己可能遇險，而是此時遇險尚屬「殉國」，而抗戰失敗則會成為民族罪人，兩者相權，前者尚屬較輕。

此外，蔣介石對自身的生死雖然沒有達到「置之度外」的程度，但他對部下的生死似乎不願多談。除了上述例子外，1946年3月17日戴笠意外墜機身故，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手稿本中對此二事均未有記載，似可看作蔣介石「不在意」（不重視或不談）部下生死的證據。但綜合1946年3月15日日記：「閱宣言稿甚不妥，而布雷又病，甚念」；同年3月17日日記：「為黃宇人荒唐放肆以致布雷發怒，此實所罕見，以布雷從未當眾發怒」，均可看出蔣介石對陳布雷懷有感情，故筆者傾向於認為蔣介石出於某些原因而「不談」部下生死，而非對之「不重視」。

（二）「申辯」：記錄意圖與政治評價建構

手稿本中有極為明確的「申辯嫌疑」之處，即故意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記錄得極其清楚，似乎為了「展示」給後來讀者。蔣介石在早年日記中多次記錄自己「又犯色欲」，是很多學者用來證明其「記錄坦誠」的證據^⑤，其實，這種記錄既體現出前文所說的「省身」精神，也說明蔣介石並不十分重視後人對他的私德作評價。但蔣介石作為一國領袖，在涉及後世對他政治評價的事件中，雖不會「撒謊」，卻會使用「申辯」的策略，意圖為其後世政治評價進行建構。

1931年，蔣介石與胡漢民就約法問題、黨治還是軍治爭論得如火如荼，胡漢民因堅持黨權應高於政權，即黨魁的權力應高於國民政府主席，與蔣介石展開了爭奪最高權力的「約法之爭」，《中央日報》成了雙方意見交鋒的陣地。2月25日，《中央日報》發表胡漢民對記者的談話，稱孫中山從未提出「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蔣介石則認為孫中山並非不欲約法^⑥，雙方都把孫中山的提議作為自己主張的合法性來源。

在此期間，手稿本中的記載已經遠遠超出了「必要」，而帶有明顯的「申辯」和「解釋」意味。1931年2月25日至28日連續記述此事：「下午會客後，為胡事又發憤怒，回湯山休息，彼堅不欲有約法，思以立法總任意，毀法變法，以便其私圖，而置黨國安危於不顧，又言國民會議是為求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不言約法，試問無約法，何能言統一，何能言建設，總理革命，不欲民國元年參議院之約法，而主張重訂訓政時期之約法，重訂革命之約法，而非不欲約法也……故中正痛定思痛，乃有此電，欲要求速訂約法，速開全國代表大會，速開國民會議，以免國內戰事，不使再有軍閥復起……本晚宴客留胡漢民在家中而防其外出搗亂也。」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漢民的主張進行針對性駁斥，可見此處的寫作並未僅僅用於個人記錄，而事關後世對其本人的政治評價。

針對輿論的討伐，蔣介石將應對之詞都寫在日記中：3月6日，「今日各報轉中央通信社消息，以展堂暈厥二次病重之說，謠惑人心，一面使余畏懼，對展堂不敢有此主張，令其回寓，自由文人書生，用意之拙劣，誠為可笑，殊不知黨員為官吏，皆無自由，何況展堂處於嫌疑，有被懷舉之道，黨中文人，垂於私情，忘卻公義，以余今日為對不起展堂，傷友朋之情」。3月7日，蔣介石利用「黨員為官吏，皆無自由」這一觀點四處游說：「上午覆溥泉（張繼）電，其中說明黨員與官吏無自由之理，吾輩為言自由，則人民與黨國無自由矣。」

如前所述，手稿本使用的是固定格式的稿紙，因此蔣介石平常往往遵循限制，將日記記錄在一頁中，幾日連記的情況很少發生。上述這種「連記」本身就表明其內容是蔣介石在心情不平時，由旺盛的表達欲而產生的文字。蔣介石在「約法之爭」中的日記寫作帶有非常鮮明的「申辯」意味，他在當時便通過游說和演講的方式^⑩，反覆強調「黨員無自由」，可推測為蔣介石在寫作時便考慮到日後可能的政治評價。

(三)「沉默」：「不記」與「缺失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本在不少事件中出現不尋常的「沉默」。「沉默」大致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經過歷史學家考證，確實由蔣介石直接發動的歷史事件未在日記中提及，或因蔣介石出於維護自己的形象而有意隱瞞；第二，由蔣介石直接發動的運動，出於外交或輿論考慮，不便在日記中提及；第三，據學者推斷應該與蔣介石直接相關的事件未在日記中提及，因此無法判斷蔣介石是否知情。

第一種「沉默」的直接例子就是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大事長編》在1927年4月12日明確記載「公令上海舉行清黨」^⑪。4月，蔣介石頻繁與包括上海青幫在內的各派人員聯繫，日記中卻未提及；9日日記僅僅記載了「季陶來談，甚嫌惡其頹喪也，悲痛斥責之」，並未解釋戴季陶頹喪的原因，也未記載其他特殊內容。之所以說蔣介石此時故意「沉默」，可以參照他在1926年春的日記中並不避諱記錄各種政治派別的紛雜狀況，也會對各方局勢進行分析

和應對：3月10日，「今日反蔣運動傳單不一，疑我，謗我，毀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漸顯明」；31日，「季新〔汪精衛〕兄行蹤仍無下落，此種不負責任之行為……無怪總理平生笑其為書生為調和派也」；5月1日，「今日為勞動紀念節，共產派與右派之雙方工人仇視似有自相衝突之勢」；14日，「黨國與本身存亡之際，其困難苦痛，蓋為此也，上午外出散步，回寓會客，各界代表來見，請求解決共產謠傳事與鮑顧問等，磋商國共二黨協定事項」。

由此可見，1927年4月日記中的「沉默」極不尋常，應為蔣介石有意保持沉默。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沉默」並不是「撒謊」，雖然研究者不能在日記中找到「四一二政變」的文本證據，但是這種「缺失文本」的情況卻仍然能夠說明蔣介石與這些事件並非無關。暗殺聞一多事件即可作一反例，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1946年7月17日、20日日記中詳細記錄調查過程，並在隨後的〈本星期反省錄〉中明言「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殊所不料。幹部之無智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從這些文本看，蔣介石確實未下令刺殺聞一多，並且對這一行為帶來的惡劣影響極為反感。

第二種「沉默」出現在新生活運動開始期間。這一運動由蔣介石主力推動，為了向城市居民普及城市生活的規則，是對軍隊改造的擴大化嘗試。他在1934年2月19日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倡導國民「生活軍事化」，以「禮義廉恥」為道德標準，從國民日常生活入手，進行社會改造^⑩。但奇怪的是，手稿本在1934年2月內均未提及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的表達欲極強，常常在日記中不厭其煩地進行局勢分析和政策解釋，例如1929年8月4日，即在日記中全文分析俄國與東北局勢。新生活運動開始時期的「沉默」可能出於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的複雜情感。

當時社會一直懷疑蔣介石試圖在中國推行法西斯主義，天津《大公報》曾在1932年向蔣介石本人專電查詢其是否傾向「組織法西斯蒂〔法西斯〕團體之運動」^⑪；蔣介石曾在1935年力行社（俗稱「藍衣社」）內部講話中稱「法西斯可以救中國」^⑫，而這次講話內容也未在日記中提到。蔣介石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德國能夠衝出重圍，實現富國強兵非常羨慕，認為進一步實現中國社會組織的軍事化，是進行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然而，與他實際認同的「省身自律」、「禮義廉恥」、「三民主義」等觀點不同，他始終未在日記中提及對法西斯主義的理解和認同，這說明他也許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作為一種實用工具，但並不認同法西斯主義。正是這種對法西斯主義的雙重態度，以及在1934年尚不能言明「對日備戰」等因素，導致了日記未在新生活運動伊始記錄蔣介石的相關想法。對於日記未記錄新生活運動一事，其史料的有效性在於研究者可以根據其他材料，推測此時蔣介石對於法西斯主義、全民備戰和抗戰輿論等其他事務的態度。

第三種「沉默」的情形是無法推斷蔣介石是否對事件知情。1929年，胡適批判國民黨政府未對訓政制訂時間限制，也沒有制訂約法，本質上指一種專制統治，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民國日報》在同年8月間刊發相關文章，指責胡適「侮辱總理、背叛政府」，國民黨第三區黨部呈文中央訓練部，要求對胡適進行逮捕。此事最終以「國民黨中央規定，各級學校教職員每天至少須有半

小時自修研究《孫文學說》等黨義》以及「上海《民國日報》、南京《中央日報》等發表一批文章，對胡適進行批判」而結束⁴⁹。既然是國民黨中央做出反應，此事應曾經向蔣介石匯報，但是1929年8月、9月恰逢宋美齡小產、蔣介石夫婦在自家險些遇刺兩件大事，手稿本記載此間蔣介石多日陪病，主要研究遇刺案情以及中俄外交事務，對其他事務的記載非常簡略。因此，僅從日記無法推斷相關政策是否由蔣介石動議。就文獻效度而言，在這種議題上，基本可認為日記是無效的。

(四)「不知情」：真實與偽裝

手稿本中某些「真」不知情的敘述，由於當時當地的敘述語言與其後發生的事情反差巨大，反而能準確地判斷出蔣介石「無意」中記下了自己的真實態度。1929年，馮玉祥開始準備反蔣，社會上流言風起；4月13日，馮玉祥不得不發通電闢謠，陳述自己「與世無爭」、「服從中央」⁴⁹。對此，蔣介石並未警覺。「無風不起浪」，馮玉祥部已經暗自動作，5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馮部人員全部離京用具皆出賣殆盡，書檢，接其文電準備向潼關退卻，如此自擾，臧以國家為兒戲，何能革命。」此時，馮玉祥離京，將駐地所有器具變賣，便是再沒有回京的意向。果不其然，18日日記又載，「下午接馮孽劉郁芬孫良誠等通電討蔣擁戴，馮玉祥為護黨敬國軍，西北軍總司令而馮覆余無電，欲吾下野，可笑已極」。可見在此期間，蔣介石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馮玉祥討蔣的情報，對其變賣器具極為不解，甚至有些譏諷的意味，卻沒有察覺其意圖從而做好準備。

1930年代，由於中德關係交好，蔣介石又組織「力行社」對其個人效忠，社會上出現蔣介石是否認同法西斯主義的議論。「裝作」不知情就體現在蔣介石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上。前面提到1932年《大公報》曾電問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7月9日日記詳細記載了此事的經過：「《大公報》電詢組織『法昔司蒂』（法西斯）之有否，余提筆覆之曰：『中國革命只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方能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為國民黨員，死為革命黨魂，不知有其他組織也。』」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所謂「『法昔司蒂』組織」指的是力行社，也必然知道社會對他是否傾向法西斯主義的議論，他回覆《大公報》的電文詳細記錄在日記中，具有一種「自辯清白」的意味。

從上述兩例對比可見，如果日記記載了蔣介石對某一重大歷史事件背後原因的猜測遠遠背離事實，則證明當時他對這一事件的背景真的毫不知情。但如果他在日記中寫下「不知」字樣，則有「裝作」不知情的嫌疑。

(五) 回歸人性：手稿本中的豐富情感與態度

以日記為中心的人物史研究需要回歸人性本身，從「人」的角度來理解研究對象。手稿本為了解蔣介石的豐富個性提供了一個窗口。日記文本中的情感及其可信性之間的關係，是個值得深挖的領域。蔣介石本人具有強烈的表

達欲，情感豐富，其日記在敘事之外具有大量的情感記錄，即便對敏感事件進行了隱晦處理，蔣介石也仍然相對真實地記錄了自身情感，研究者可從情感角度出發，將其情感反應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推測蔣介石對某些人物、事件的真實看法，甚至反推事件真相，前文所述馮玉祥討蔣即為一例。

筆者認為蔣介石重視新聞宣傳對於軍事和政治的意義，「向世界揭露日本暴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宣傳，都是他首先動議並開展的，可見他渴望親自向記者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說明政令政策，寄望報章能幫助他建立有利的輿論氛圍。即便是侍從室代擬的稿件，他也常常覺得不合心意，必須親自修改，將自己的想法真切地表達。因此，手稿本中如軟禁胡漢民等用了較大篇幅書寫的事件，往往意味着這些事件刺激了蔣介石的表達欲^⑤，使他傾注了較多關注。

蔣介石的情緒波動很大，手稿本中大量記述了他的個人感受。例如，1928年7月7日，外交部發表宣言，聲明將與各國討論重訂新約，並廢除各項期滿舊約^⑥，但日記卻只記了「上午會客，下午陪三妹入病院，晚住湯山」，毫無對該宣言的評價，甚至沒有情緒波動。這與1943年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時的記述有極大差異。1943年的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蔣介石盼望藉着廢除舊約塑造自己作為民族拯救者、國家雪恥者的形象。1943年元旦前後的日記提到對廢約宣傳的細節進行了細密的安排；元旦當日，英美突然提出延遲五日舉行廢約儀式，令蔣介石十分懊惱，他在1月3日日記中直言：「美英新約不能在元旦如期舉行，乃為平生遺憾，更知外交被動之苦也。」這種情緒表達的區別也可以看作是蔣介石對兩者的重視程度不同。

眾所周知，「怒」困擾蔣介石一生，也是日記中反映的第一大情感。蔣介石時常發怒，妻子、親人、部下都曾是其發怒的對象。前述1931年「約法之爭」中，蔣便曾多次「發憤怒」。但他每每發怒完畢，又會在日記中檢討自己「失態」，鼓勵自己「養氣」、節制。例如，1941年5月19日的日記中，即載有「近日言多失檢，懊悔叢生，推厥原因，多自矜持暴戾嫌惡悲憤而生，無他」等。

此外，日記中還有哀、樂等情緒表達，這些飽含情緒的文本，體現了蔣介石為何而樂、為何而哀，最能窺察出他的真實性格。他的快樂大多源自家庭生活，例如1932年7月30日載：「上午會客後，與妻甥等往遊含鄱口，及附近林場，誠一仙境也。在九十九峰亭，看漢陽峰，與鄱陽湖，心神怡悅，思想開展」；1943年7月5日載：「生病臥牀，經緯探病後辭去，夫妻二人晤談別後經過，妻又報告留美經過要務，殊感欣慰」。蔣介石愛好自然景觀，時常遊歷名勝風景，也給他帶來不少快樂，例如1928年10月27日載：「天晚即回程，月白風清，湖水為鏡，樂也」；1939年4月12日載：「上午獨坐樓廊，靜聽鳥聲，曠觀山色，生氣蓬勃，愁悶數周，今日始得興趣，觀稚老〔吳稚暉〕斥汪下文，尤感快樂，不忍釋卷，連讀三次，愈覺愉快」。蔣介石雖極重紀律，但並不缺乏幽默感，偶爾還會在日記中記錄好笑之事，例如1945年7月12日載：「美國情報處長【鼻塞兒】來談，留餐」，他在手稿中故意將「鼻塞兒」加上標示框，可以推斷當時逗樂的心情。

蔣介石生性樂觀，認為「人定勝天」，很少表現哀傷或者厭世的情緒。他與母親關係甚為密切，母親去世後，蔣介石常常觸景生情，表達喪母之痛。1928到1949年的日記中，記有一首蔣介石自作的詩詞，即1929年8月2日的「月光冷，蟋蟀悲，夜氣清，孤裘寒，惟母魂來照臨，我母亡，人母存，菩提既警覺，莫滯疑，罷罷罷，快快快，何處去何處來，報思親還天地，人間事還人間」，展現出蔣介石此時的哀傷。全面抗戰初期，戰火橫肆給平民百姓帶來的傷害，也使他很受觸動。例如，1938年9月3日載：「每見民眾之菜色與婦孺之苦痛，不堪言狀，此謂動心忍心之實情，然此不得而知也。」

五 餘論

通過橫向的材料對比和縱向的日記話語和情感分析可以發現，作為歷史研究材料，《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因其真實性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日記的文獻效度，需要嚴格的論證和謹慎的使用才能得到保證。學界基於手稿本的研究，除了需更加注重材料的細節問題，更要加強話語和情感分析。

此外，手稿本部分日期比較模糊，也給研究設置了一些障礙。例如，1929年Box7/Folder2中的日記顯示為2月，但是由於前述「連記」關係，實際日期不可考；該文本後半部分記敘蔣介石十五歲時，孤兒寡母備受劣紳污吏欺壓，「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凡可以強吾身體，勵吾之志願，結交友好，可以為吾上進之路，無不努力竭慮，雖歷盡艱苦，亦此不息」，以及二十五歲時「從總理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協助英士，以謀再起，一面讀書，曾文正全集即於是年看完也」。由於這些文本敘述的時間跨度長達十餘年，又無法推定撰寫日期，因此只能按字面理解意思，無法推斷蔣介石在撰寫相關文字時的心態。

另外一例也關乎記錄日期。1933年11月23日日記的中間部分記有「雪恥，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27日日記結尾為「雪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譚〔談〕喝飲匈奴血」；28日記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均出自岳飛的《滿江紅》。但這種飄忽不定的記述位置，使得研究者無法推斷這幾天的日記是同一天「連記」的，還是按照其顯示的日期分別書寫的。與每日書寫的日記相比，同一天「連記」的日記可能與事實的差距更大。在上述例子中，如果23日至28日的日記為「連記」，研究者使用時則需更加審慎。

本文認為，手稿本的「自省性」與「展示性」是與「真實性」相關的兩個重要特點。日記的「真」，在於其「省身」的寫作動機，「假」來自於其「展示性」以及對後世政治評價的顧慮與記錄的有限性。筆者認為，通過與其他相關材料的比較對照，手稿本這份材料實在記錄的文字，均大體可認為是真實的；某些文字包含的感情愈強，則可以認為蔣介石對這一「情感標的物」的評價愈真實。同時，飽含情感的文本，對於研究者分析蔣介石的人物性格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說，對於目前尚無定論的史實，或許可以根據蔣介石的性格、行

為習慣，以及日記文本有否相關記錄進行推斷。就研究領域的開拓而言，其日記所蘊藏的個人性格，可以不受歷史研究的局限，更廣泛地在心理學、行政學領域進行研究探索。手稿本記錄了蔣介石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理應受到歷史研究更多的重視。

註釋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下引不再另註。1915年的日記僅存十三天，1916、1917和1924年日記缺失。
- ② 楊天石：〈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1期，頁33。《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向公眾開放後，楊天石是第一批前往胡佛研究所查閱並引用的學者之一，專著有《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等十餘種。
- ③⑩ 徐雁平：〈從翁心存、翁同龢日記的對讀探究日記文獻的特質〉，《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頁122；122-28。
- ④⑭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209；79。
- ⑤ 「日記研究」屬文獻研究的一種，本文使用「日記研究」(Diary Research)這一名稱，主要依據Lauri Hyers, *Diary Methods: Understand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3。
- ⑥⑳㉓ 楊奎松：〈關於民國人物研究的幾個問題——以蔣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狀況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頁107。
- ⑦ 尹德翔：〈晚清使西日記研究：走出近代化模式的構想〉，《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48-52；李若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的廣州畫壇：以謝蘭生《常惺惺齋日記》為中心〉，《美術研究》，2015年第6期，頁32、41-48；徐雁平：〈用書籍編織世界——黃金台日記研究〉，《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頁127-40。這些日記研究實為日記文本研究，並無日記作為研究材料的討論。
- ⑧ 舒習龍：〈日記與近代史學史研究：梳理與反思〉，《蘭州學刊》，2017年第10期，頁46-56。
- ⑨ 劉明月、范鐵權：〈民國日記作為史料的研究價值——以《忘山廬日記》研究為例〉，《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3期，頁106-11。
- ⑩ 鄭會欣：〈抗戰時期後方高級公務員的生活狀況——以王子壯、陳克文日記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頁146。
- ⑫ 劉增傑：〈論現代作家日記的文學史價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兩個問題〉，《文史哲》，2013年第1期，頁128-29、135。
- ⑬ 桑兵：《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94-95。
- ⑮㉔ 川島真：〈近代日本政治人物與日記——日本史學界對其史料價值與運用方法的討論〉，載呂芳上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57-61；57。
- ⑯ Irina Paperno, "What Can be Done with Diaries?", *The Russian Review* 63, no. 4 (2004): 561-73.
- ⑰㉕㉖ 楊天石：〈蔣介石日記的現狀及其真實性問題〉，頁35-36；33-34；36。
- ⑱ 楊奎松：〈四次血案幕後：蔣介石的智與不智〉(2012年4月29日)，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52809.html。

- ⑲ 黃自進：〈蔣中正的訪日經驗(1906-1927)〉，載《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頁157-82。
- ⑳ 家近亮子：〈蔣介石1927年秋的訪日——《蔣介石日記》與日本新聞報導的比較分析〉，載《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頁251-66。
- ㉑ 王成勉：〈1947年魏德邁調查團的再評估——兼論蔣中正的應對〉，載《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頁307-29。
- ㉒ 段智峰：〈差異何其微妙：《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的對比〉，《浙江檔案》，2017年第4期，頁44-48。
- ㉓ 吳淑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五冊(台北：國史館，2004)，頁577。
- ㉔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四十一冊(台北：國史館，2010)，頁685。
- ㉕ 方漢奇與筆者面談時提到的看法。
- ㉖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二卷(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頁185。
- ㉗ 這份日記摘抄本以PDF文件的形式在近代史研究者中廣泛流傳，本文無法引證出處，僅以此說明出處不可考的《蔣介石日記》極易混淆研究者的視聽，當謹慎使用。
- ㉘⑲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一卷，頁120；153。
- ㉙ 楊天石口述，劉志平記錄整理：〈楊天石談《蔣介石日記》〉，《紅岩春秋》，2014年第10期，頁22-23。
- ㉚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頁3-7。
- ㉛ 從手稿本原文看，自1926年後，蔣介石的讀書偏好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相關考證可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宋明理學〉，《貴州文史叢刊》，2013年第4期，頁29。
- ㉜ 〈胡院長談國民會議意義 國府電令各省市籌備選舉〉，《中央日報》，1931年2月25日，第3版。另參見手稿本在1931年2月25日至28日連記內容。
- ㉝ 綜合日記原文，1931年3月2日：「上午軍校國府紀念周講演，報告胡漢民反對約法，辭職經過」；4日：「晚宴立法委員說明胡案」；7日：「上午覆溥泉〔張繼〕電，其中說明黨員與官吏無自由之理，吾輩為言自由，則人民與黨國無自由矣，與鄒陳議宣傳」；9日：「國府紀念周演說，胡漢民、自由問題、黨員無自由之訓，詳告之」。
- ㉞ 〈蔣委員長在行營紀念周講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知識份子應先負起復興民族重任 以昨死今生決心達成新生活運動〉，《中央日報》，1934年2月27日，第6版。
- ㉟ 〈蔣委員長明志闢謠 反對中國國民黨以外之組織方式 惟一志願為復興國民黨革命精神〉，《大公報》(天津)，1932年7月11日，第3版。
- ㊱ 高華：〈蔣介石民族主義觀之得失〉，載《歷史學的境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39-49。
- ㊲ 楊天石：〈胡適和國民黨的一段糾紛——讀胡適日記〉，載《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頁240-41、243。
- ㊳ 〈馮玉祥表示病癒即來 本人始終絕對服從中央 望邦人勿輕聽挑撥謠言 今惟有同心擁護蔣主席〉，《中央日報》，1929年4月16日，第3版。
- ㊴ 關於蔣介石常有因情感旺盛而難以停筆的狀況，他在日記中曾有親筆記錄，如1931年約法之爭期間，3月8日記有：「晨起草陣亡將士祭文稿，一起筆則情不自禁，不能停筆，直書千餘言。」
- ㊵ 〈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外交部宣言〉，《中央日報》，1928年7月8日，第3版。